

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

俞樟华 姜欣星 等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

俞樟华 娄欣星 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 / 俞樟华, 姜欣星等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207 - 10460 - 1

I. ①古... II. ①俞... ②姜... III. ①传记文学评化
—中国—古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8734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封面设计:张 涛 李德铨

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

俞樟华 姜欣星 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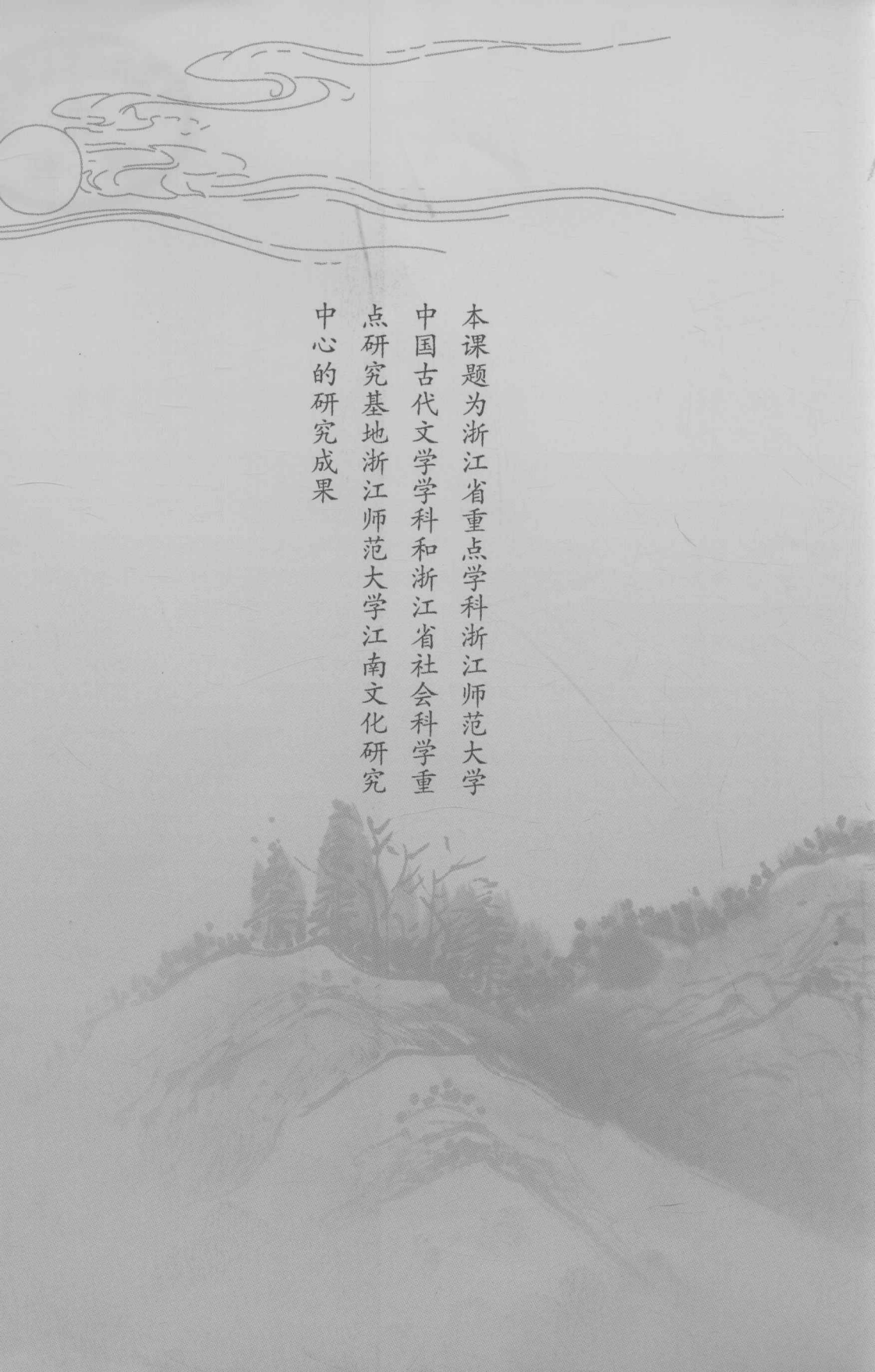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460 - 1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本课题为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
中心的研究成果

前言

传记,即以记载人物言行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文体样式,“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①而在这些传记中除了以记载人物为主的史传、家传、托传等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传记形式——假传。所谓“假传”就是借鉴史书人物传的写作手法为器、物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观念和社会理想。

“假传”滥觞于唐代韩愈《毛颖传》。《毛颖传》以记载人物传记的写作形式为“毛笔”这一物品立传,全文以史传笔法介绍了毛颖的家族、籍贯、出身,以及毛颖入宫受用,得幸升迁,最后老而失宠被弃的仕宦经历,篇末还有太史公的议论,以嬉笑幽默的笔触抨击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宣泄其怀才不遇的愤恨。韩愈在游戏笔墨之下寄寓了深沉的政治感慨,不仅具有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②的审美效果,包含了气盛言直、幽默诙谐的美学风格。

自《毛颖传》之后,假传作品大量涌现,仅明代的假传作品就有 200 多篇;所传物品也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假传记载的范围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特别是宋代的假传,记载的对象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书斋必备物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例如陆龟蒙《即墨侯传》、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洪刍《陶泓传》、徐珊《太钝生传》为“砚”立传;李纲《方城侯传》、陈造《蘄处士传》为“棋

①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53 页。

② 柳宗元:《柳宗元全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7 页。

局”立传;秦观《清和先生传》、唐庚《陆嫕传》、刘跂《玉友传》、任士林《真一先生传》、刘启元《陆生传》、林金《曲蘖生传》为“酒”立传;刘子翬《苍庭筠传》、杨维桢《抱节君传》、洪璐《管若虚传》、宋琬《竹尊者传》为“竹”立传;邢良厚《黄华传》、马揖《蘩先生传》、杨维桢《黄华先生传》为“菊”立传等。除了文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一些假传还巧立名目,为一些日常生活中人们深恶痛绝的老鼠、跳蚤等立传,如胡文焕《玉衡侯传》为老鼠立传,陶泽《欧阳憎传》为蝇立传,《辛螯传》为蚊立传,《混沌迟传》为虱立传,《毛隐传》为蚤立传等。

另一方面,随着假传数量的增多,假传作品呈现系列化的倾向。自明代开始,假传作品不局限于一传只写一物,而是数物合传,出现系列化的倾向,例如李贽《三友传》为黄莺、燕子、喜鹊作传;陶泽《六物传》为竹夫人、汤婆子、蝇、蚊、虱、蚤作传;支立《十处士传》为布衾、木枕、纸帐、蒲席、瓦垆、竹床、杉几、茶瓯、灯檠、酒壶作传;刘鸿《十二姬传》为笔、墨、纸、砚、水注、裁刀、锥、朱砂、镇纸、笔架、戒尺、笔帖等十二种文房用品作传;陆奎章《香奁四友传》为金亮、木理、房施、白华、梳、脂、粉、周准、齐钁、金贯、索纫、剪、针、线等物品作传;董穀《十五子小传》为梅、杏、花红、石榴、梨、橘、柑、栗、银杏、核桃、柿、枣、桃、李、樱桃等十五种果品作传等。随着系列化假传的问世,也出现了一些独立成书并刊行的假传文集,如《十处士传》《香奁四友传》《豆区八友传》等。

假传的文体归属向来是存在分歧的。以学术界对《毛颖传》的评价来看,孙昌武先生认为《毛颖传》在文体上,介于寓言和传记之间,中间还利用了小说笔法。^① 韩兆琦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则将《毛颖传》等作品称为“寓言体的传记小说”。^② 台湾学术界将这类作品称为“拟人传”体寓言。^③ 韩国汉学界将这类作品称为“假传体小说”。^④ 所以,可以说,假传是融史传、杂传、小说和寓言为一体的文体形式,假传同时具备了这些文体形式之中的某些特点。

第一,以史为戏,戏仿史传、杂传中的人物传记

假传,首先是传记文,这从许多学者对《毛颖传》的评价可以看出,“嬉戏

①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② 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③ 颜瑞芳:《古典文学》第14集《唐宋拟人传体寓言研究》,学生书局1997年版,第127页。

④ 赵润济著,张珽魂译:《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之文,其体传也”,^①“不直戏文,盖戏史矣”,^②“以史为戏,巧夺天工”,^③肯定《毛颖传》作为传记体的文体形式和写作手法。

假传作品通过模仿史传、杂传的叙事模式和笔法,以物写人,将物品当作人来写,作品首先以介绍物品的字号、籍贯、家世、出身等内容作为开篇,使读者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读到的是一篇真实的人物传记,将读者的视野和目光锁定在作者预期的范围内,例如:

《管城侯传》:“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缺)于东墅而生昴宿,一名旄头,遂姓毛氏。”^④

《江瑶柱传》:“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海南人。十四代祖媚州,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⑤

《温陶君传》:“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性麦氏,既破,随母罗氏去其夫而适石氏,因冒其姓。”^⑥

《清和先生传》:“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后播弃,或居于野,遂为田氏。田为大族,布于天下。”^⑦

《竹夫人传》:“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后见灭于匠氏。”^⑧

《敬侏儒传》:“敬侏儒者,名子木,字承登,以字行,徂徕人也。祖伯松,长身碧髯,肤甲如龙。”^⑨

以上诸篇假传的开头都将物品当作人来写,通过介绍传主的家世出身为下文传主将要展开的“人生”事迹的描写做铺垫。

① 姚鼐:《广注古文辞类纂》,世界书局印行 1935 年版,第 14 页。

② 吴文治:《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16 页。

③ 吴文治:《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29 页。

④ 陆龟蒙:《全唐文》第 801 卷《管城侯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419 页。

⑤ 苏轼:《全宋文》第 91 册《江瑶柱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6 页。

⑥ 苏轼:《全宋文》第 91 册《温陶君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1 页。

⑦ 秦观:《全宋文》第 120 册《清和先生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9 页。

⑧ 张耒:《全宋文》第 128 册《竹夫人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 页。

⑨ 杨万里:《全宋文》第 240 册《敬侏儒传》,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 页。

接着叙述传主的主要生平经历,大多数假传多从传主历代先祖的杰出事迹开始记载,例如《梅先生传》开篇对于梅伯、梅福事迹的描写,《璞隐者传》开篇对于墨氏先祖显于秦,封为松滋侯,其后瑜麋与管城子颖同升,后扬雄以客卿之,隐于蜀等事迹的描写,通过介绍传主先祖的言行事迹展现这一类物品历来所特有的功能和特性,通过夸张、荒诞的手法,或称颂其高尚的道德品行,或讽刺其蛊惑人心的卑劣行径,奠定了文章幽默诙谐的风格特点。还有一部分传记仅以记载一人的事迹为主,例如《万石君罗文传》主要叙述了罗文隐居自晦,后经毛纯引荐,待诏中书,后拜舍人,丞相御史。时人以文苑四贵称之,后因年老以及官场斗争失宠而卒的生平事迹。《叶嘉传》记载了叶嘉因独特的才能和品行受皇帝喜爱,封为矩合侯,任尚书,宠爱有加,后因嘉苦谏,与皇帝疏远,后为皇帝献策重新获得赏识,其功德亦延及子孙后代,为世人所称颂。有时无须多说其先祖或后世子孙的影响,仅以一人的言行事迹就可以表达出这类物品的特点和价值,传达作者对这一物品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寄寓了作者一定的创作观念和社会理想。

最后在传尾还附有作者的论赞,或从传主的道德品格方面,或从传主的仕途经历方面,或从传主对于社会的贡献方面,总结传主即某一类物品的本质特征,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这类物品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较为公允地评价了这类物品给社会、给人生带来的影响。李纲在《武刚君传》“太史公曰”中评价了武刚君(宝剑)的性格品行:“观其为人明利果断,不凝滞于物,劲正之气毅然见于色,其亦锻炼淬砺之力欤。卒能佐汉以兴,传国数百载,可谓盛矣!”^①赞扬武刚君为人处世明利果断和人格品行的高尚,肯定其在历史上辅佐王朝兴亡更替的价值和作用。《方城侯传》“太史公曰”中说到方城侯(棋局)二子虽不以诗书礼乐而以兵为家法,“攻伐不休,废时乱日”,但在作者看来,方城侯之学乃是“法象所寓,有圣人之遗意……亦有足观者”^②,肯定方城侯的可取之处。《文城侯传》“太史公曰”评价文城侯(印章)立志节,以信著天下,但是却有人“窃借其名以行”,虽“信反而为伪者”,但“诚非其罪故也”^③,对于现实中人们

① 李纲:《全宋文》第172册《武刚君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② 李纲:《全宋文》第172册《方城侯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③ 李纲:《全宋文》第172册《文城侯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窃取印章作伪证之事给予了批评,对文城侯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苏轼《清和先生传》“太史公曰”说到世人对于清和先生(酒)的评价“誉之者美逾其实,毁之者恶溢其真”,“未有至公之论也”,所以作者总结到清和先生在激发壮气、解释忧烦、使布衣寒士乐而忘其穷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而唯一的缺点在于“至久多变”^①。

假传在写作手法上模仿史传这一文体形式,将物品当作人来写,以幽默诙谐的笔墨,通过记载人物即物品的家世、生平、籍贯及主要事迹等内容,表现物品的功能和特点的同时寄寓作者对这一物品,以及这一物品对隐喻内容的看法和评价。假传,将严肃庄重的史传体和虚诞怪妄的杂传体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对所传物品进行真实细致的描绘,总结其较为全面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在描写传主事迹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丰富传记的内容,形成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在幽默诙谐的字里行间寄寓作者的创作宗旨。

第二,诙谐戏谑的文体特点

(一)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假传多以夸张、荒诞等手法,将与传主有关的典故、佚事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制造出诙谐幽默的喜剧场景。

张耒《竹夫人传》为“竹夫人”作传,将武帝与卫皇后等众人避暑甘泉宫一事敷衍成篇。竹夫人因善良高洁得到引荐,常伴皇帝左右,但“归未央,坐温室,夫人自此宠少衰”^②,竹夫人只有在夏天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篇尾还引用班婕妤失宠作《纨扇诗》的典故,表面上是写皇帝与妃子的爱情故事,其实不过是借这一故事介绍竹夫人这一器具的功能,即在夏天能够为人们消暑,而在其他时节,只能被弃之一旁的现实处境。杨维桢《竹夫人传》开篇“其先为孤竹君之子曰智,谏武王伐纣,不听,遂不食周粟,饿于首阳山,且死”,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张冠李戴,作为竹夫人先祖的事迹敷衍开篇。竹夫人以清节家世著称,耻屈身于人,即使是王后嫔妃、公卿执事招之亦不往,“其行踪诡秘,当炎而出,方秋即遁去”,以应鼻祖氏之言:“吾不食死,百世后

① 秦观:《全宋文》第120册《清和先生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② 张耒:《全宋文》第128册《竹夫人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当有不食饮者，为吾女氏，以救世之浊热，然未尝如锁子妇之隳其节也。”^①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以夸张、荒诞的手法展现竹夫人不屈于人，高尚自持的特点。王冕《梅先生传》在情节设置方面，开篇就借用直言谏姐己事、以文学补南昌尉、曹操行军失道将士望梅止渴的典故作为凸显梅先生先人忠言直谏、洁身自好高尚品行的例子，赞扬梅先生自古乃“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②。

假传作者通过想象、夸张等手法，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形式，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历史典故、历史情景、人物佚事等内容进行重新演绎，或作为传主先祖发源的故事，或作为传主某一重要的生平事迹，不管作者以何种形式敷衍历史典故和趣事，其目的亦在于通过人们较为熟悉的情节和故事，展现传主的人生事迹，在表现传主道德品行的同时也隐含了这一物品所具有的功能和特性，及其在历史人生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二）在文章的叙述中，假传还巧妙地融入既能够逼真刻画传主性格品行的特点，又能够暗中隐喻物品功能的语带双关的句子和词汇，营造出亦真亦幻的叙事氛围，具有双重寓意。

陈造《蕲处士传》从正反两面描述了蕲处士（棋局）的为人品行，一方面，蕲处士以好洁便静、机变警敏的性格特点广交王公庶人，“泛交可多，自王公庶人，有好之无不往，往辄从容竟日。至于闲逸奇嫠之人，掘穴嵌严栖迟之仕，尤与之昵，往往定忘年之交。先以有行，自矜其实，挟数以邀世，机变警敏，无与敌”；另一方面，又因其“任数以肆欺，好胜而喜杀，欲赢而置人于贫，苟生而不恤人之死”^③的性格特点，使与之交的王公庶人迷而不知反，通过蕲处士（棋局）语意双关事迹的描写，既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也隐喻了棋局具有消遣娱乐功能的同时亦又好战、迷惑人心的一面，劝解世人应该讲究适度的原则，在娱乐消遣的同时不应沉溺其中。同样是描写“棋局”，李纲在《方城侯传》中描写方城侯（棋局）时重点描述了方城侯两子连年不断的战争：“子平有二子：长曰太素，次曰太玄，……二子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太素矜太

① 杨维桢：《全元文》第42册《竹夫人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② 王冕：《全元文》第60册《梅先生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③ 陈造：《全宋文》第256册《蕲处士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390页。

玄之弱,尝听其增甲兵、布行陈、定营垒,然后与之战,而太玄傲然不服,转战逐北,虔刘其边陲,俶扰其腹心,掳掠其士卒,攻围侵断,智诈百出。战罢效首虏,计土地,虽胜负不常,而太素之胜居多。其用兵之法,虽临事制变,不可窥测,然循理而动,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常胜;不计利害,深入浪战者常败。”通过二子的战争比喻现实生活中斗争的策略战术问题,指出战争形势虽千变万化不可预测,但应该循理而动,不计利害关系,一味只知道打仗的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以方城侯两子的战争隐喻下棋的双方同时也是双方用兵之法的较量。在战争下,“夫方城阖四境之内,地方不过数百里,而二子之战,积月累岁,纷拏不解……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者”^①,隐喻现实生活中统治者之间在利益的驱使下发起无休止的战争,致使战士尸横遍野、百姓生活困苦的历史现实,作者通过语意双关的词汇描写方城侯二子的战争,一方面逼真刻画了二子的性格品行,另一方面也隐喻了棋局这一物品战争不断、讲究用兵策略、伤亡惨重等特点。

同样是描写“酒”这一物品,秦观《清和先生传》主要描写了“酒”的制造过程:“有神农之后利其资,率其徒,往俘于田而归。其倔强不降者与强而不释甲者,皆为城旦舂。赖公孙杵臼审其轻重,不尽碎其族,徙之陈仓,与麦氏、谷氏邻居,其轻者犹为白粲与鬼薪件。已而逃乎河内,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于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为氏。”^②其中“神农”“麦氏”“谷氏”暗指酒的原料,“陈仓”“河内”“曲沃”等地的迁移,则隐喻了酿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双关、谐音和隐喻等手法描写了“酒”的整个制造过程。随后,记载了“酒”的功能特征:“及长,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有蕴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无不滥觞。孟子称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谓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间而兼有其德,因自号曰‘清和先生’云”^③,从气度非凡、蕴藉深厚、清德兼备等方面赞扬清和先生“酒”的为人风貌和行事特点,这些特点同时也是“酒”这一物品的功能特性。杨维桢《鞠生传》在赞扬鞠生(酒):“其人呕呕温雅,凡冠婚丧祭朝燕飧礼无不预,号为通才,尤善导引辟穀

① 李纲:《全宋文》第172册《方城侯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

② 秦观:《全宋文》第120册《清和先生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③ 秦观:《全宋文》第120册《清和先生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之术,故其人最善寿。饮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渐其化,无不醉而陶出其性真”^①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麴生之言甘,后世必有以之亡国者”,“溺之者亡国杀身”^②的祸患,语意双关,隐喻现实生活中酒能够陶冶真性情的同时也可以给人们带来亡国、杀身的祸患,深刻揭示了“酒”这一物品的本质特征,劝解世人勿沉溺其中。

这些描述传主性格品德和人物事迹的语言,都极尽体物之妙,语带双关。一方面,既能够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传主的性格品行,另一方面又可以暗示出所传之物的功能特征,与此同时也隐喻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社会现实,作者希望通过传主人物言行事迹的描写和道德品行的刻画,以道德节操高尚的人物事迹正社会之风,以人物宦海浮沉的人生事迹隐喻人生之道,以人物之间斗争攻伐的事件场景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语带双关,寓意深刻。

第三,寓意深刻的文体意义

假传自韩愈《毛颖传》开始就呈现出寓意深刻的文体意义和价值。从关注仕途穷达、君臣遇合,到关注个人道德品格,到对世态人情的讽刺,古代假传作品成为文人们反映自身创作观念,抒发理想感慨,揭露社会现实的重要工具。

(一)君臣道合,功成身退的主题

清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夫知尽之难,则君臣道合,故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君不疑,与君交争而不罪,而得明计国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禄于身,以此君臣相执持,此说之成也。”^③君臣道合,看重的是君臣共治的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关系。隋唐之际出现的这种君臣之间新的关系,不仅是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天下士人所希望看到的和得到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尊重的关系。^④但是,君臣道合作为君臣关系最为理想的范例,强调的是君臣共治天下的过程,但是最后的结果也至关重要。“成功之下,

① 杨维桢:《全元文》第42册《麴生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② 杨维桢:《全元文》第42册《麴生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③ 张守节:《四库全书》第247册《史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2页。

④ 胡宝华:《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

不可久处”，“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诘，往而不能返者也”，^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唐以后的假传开始更多讨论这个问题，在君臣道合之下，如何才能功成身退。作者通过传主家世生平为官事迹的描写，寄寓了作者对为官仕途、人生之道的看法。

王禹偁《乌先生传》通过描写乌先生（桑）一生仕途穷达、君臣遇合的事迹，赞扬了乌先生深谙人生官场之道：“先生始而隐者，求其志也；中而仕者，行其道也；终而退者，远其害也。”^②功成身退，实乃天下之道也。晚唐司空图《容成侯传》写容成侯（镜）因其“挟奸邪以事上者，见之胆栗，辄自披露。至于妇人女子媚惑之态，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虽造物无私，圆方不碍。”所以致使“疵陋者终恶忌，积毁于上，以为背面不相副”。最后难逃被摈弃的命运。面对容成侯的事迹，作者在“太史公曰”中说：“观炯虽任用，兢兢惟恐失坠，不善晦匿，果为邪丑所嫉。几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③感叹容成侯因不善于晦匿遭到小人的嫉妒和陷害，道出正直之士在官场斗争之中难于明哲保身的境遇。陆龟蒙《管城侯传》写毛元锐（笔）历代先祖和后辈都因“述美恶不隐，文简而事备”为世所用，加官晋爵，毛元锐在晚年“遂恳上疏告老”的事迹得到皇帝的赞赏：“所谓达士，知知足矣。……壮则驱驰，老则休息。载书方册，有德可观。”^④两句实际上道出了君臣之间应该遵守的遇合之道，即所谓的功成身退。

自古仕途多艰难，有时并不是因为人物的为官才能和德行不够，只是因为其不知满足，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而失宠罢黜。功成身退的道理说来容易，但当你真正面对一片大好的仕途前景时，很难放弃对现有一切的拥有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真正的君臣遇合之道和为官仕途之理在于知止知足，一人的仕途经历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知止知足可以让你功成身退，得到君王赞扬的同时也可以扬名后世。

（二）个人对于高尚道德品格追求的主题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显达之时为天下百姓造福，不得志

① 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

② 王禹偁：《全宋文》第8册《乌先生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17页。

③ 司空图：《全唐文》第810卷《容成侯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26页。

④ 陆龟蒙：《全唐文》第801卷《管城侯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19页。

时就应该洁身自好,注重个人道德品格的修养。士人对于自身道德品格修养的追求不亚于对于仕途的追求。拥有高尚品行的士人,不管其仕途穷达与否,都会谨守其对于高尚道德品格的信仰和追求。

李纲在《文城侯传》中评价文城侯(印章):“立志节,以信著天下,……观文城侯信一立,而后世子孙咸显白于后世,积善之报,有以夫!”“君平之为人,刻志砺己,表表自见,……与人交,虽方圆广狭不常,然始终如一,重信义,不轻为然诺。”^①以立志节、重信义作为文城侯(印章)主要道德品行特点的描绘,对文城侯的道德品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寄寓了作者对于高尚道德节操品行的追求。王冕《梅先生传》赞扬梅先生(梅):“为人修洁洒落,秀外莹中,玉立风尘表,飘飘然真神仙中人。所居竹篱茅舍,洒如也。……先生雅于高人韵士游,徂徕十八公、山阴此君辈皆岁寒友。”^②通过对梅先生相貌为人、与高洁之士游历的描写,刻画了梅先生修洁洒落、道德品行高尚的人物形象。苏轼《江瑶柱传》太史公曰:“里谚有云:‘果蓏失地则不荣,鱼龙失水则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瑶柱,诚美士乎!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一旦出其时而丧其真,众人且掩鼻而过之,士大夫有识者,亦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处不可不慎也,悲夫!”^③世界上每个人和每种物品都有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若为了一时之需或一时之气而离开,必然会招致祸患。士大夫亦然,一旦失其时、出其地,就会丧失其真正的自己,士大夫有志者就应当保持其品行节操的高尚,成其为真正的士大夫。《黄甘陆吉传》:“传曰:‘女无好丑,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次之谓也。虽美恶之相远,嗜好之不齐,亦焉可胜道哉!”^④刘跂《玉友传》:“玉友名氏弗章,独以德称,其亦有以也。”^⑤也都是从人品道德角度对人物展开的评价。

作者主要通过对传主为人处世、性格特点等方面的描写,与行文之中展现其道德品行的优劣,及其在这一道德品行支配之下,传主人生事迹的起伏变化,或因某一高尚的品德得到世人的称颂,或因道德品行的高尚为君所用,为

① 李纲:《全宋文》第172册《文城侯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② 王冕:《全元文》第60册《梅先生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③ 苏轼:《全宋文》第91册《江瑶柱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

④ 苏轼:《全宋文》第91册《黄甘陆吉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页。

⑤ 刘跂:《全宋文》第123册《玉友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民谋福祉,得到百姓的赞扬;或因道德品行的低劣露出美好外表下卑劣的本质,为世人所不齿,这些都是世人可供借鉴的例子,在反映人物性格本质和物品功能特性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对于高尚道德品行的追求。

(三)反映社会问题的主题

古代士人在关注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以自己的文章反映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揭露社会的腐败,寄寓对于世态人情的讽刺,正是假传的题中之意。伴随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各方面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对于“金钱”贪婪,导致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此现象元之后的假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例如吴应紫《孔元方传》、胡长孺《元宝传》、贝琼《古泉先生传》、释克新《孔方传》、徐任师《孔方传》、朱骏声《孔方传》、史念祖《孔方传》等,这些假传在追溯金钱的渊源、概括金钱发展特点、总结金钱影响的同时,对人心的贪婪和世道的沦落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在游戏文笔中寄托讽喻之意。

胡长孺《元宝传》不仅记载了元宝(钱)受到众人喜爱的一面:“上自京师辅部,遐方边鄙,岭南海表、九夷百蛮之外,穿匈连颈、形语水行之民,及山栖舟居、渔樵匹士、释子冠师,一息不得宝,皆不得所欲。”上自高官,下至各行各业的百姓,都想要得到元宝,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元宝至,不问事情的轻重缓急都能够得到立马解决。而且记载了元宝的缺点:“其性贪甚,好与博徒大狙为钱交通暴豪,抄掠齐氏。事是非曲直,辄变乱以从其意。……宝方击毂连骑偏于天下,刑赏定乎其身,荣辱系乎其口。”^①从贪得无厌、胡作非为、扰乱社会秩序等方面刻画元宝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因金钱给社会带来的不良风气,给百姓带来的贪恋之心进行了讽刺。高明《乌宝传》也写到了乌宝(钱)“人争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则老稚婢隶不忻悦”,“凡有谋于宝,大小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深受欢迎的一面。另一方面,因为其“宝轻薄柔默,外若方正,内实垢污,善随时舒卷,尝谓得圣人一贯之道,故无人而不自得”的特点,乌宝“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窳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尤不喜儒,虽有暂相与往来,亦终不能

① 胡长孺:《全元文》第13册《元宝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

久留也。盖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宝好逸、恶劳、爱俭，素疾华侈”，^①生动刻画了乌宝好逸恶劳、趋炎附势、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性格特点。这些同时也是钱这一物品的主要特征。吴应紫《孔元方传》评价元方的为人“志大材疏。始折节力行”有可取地方的，但在元方得君王重用后，“谋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为功，使盗跖复生”，使其“放弃德义，以富取贵，卒无远谋，算至除陌，为国敛怨”^②的本质得到显现。贝琼《古泉先生传》记载的钱，古称泉为钱，其状外廉内方，因其能通有无的特点，至赵宋之际，已枝叶益大，盘错根据，“中国四夷皆知宝而尊之。”这些都是因为泉能够救济天下之患，“凡国有大事必资之泉，而民间尤仰之。”在表彰泉功绩的同时，作者也用大量笔墨描写了泉给社会百姓带来的弊端，即泉亦可以起天下之奸，“时吏民起而为奸，法不能禁，死者数万人，自出者百余万人”，“虽附权势，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态。然得之则贫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穷可以通。失之则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人而人争欲致之。惟其废天下。”所以，作者在“太史公曰”中总结到泉之所以可以祸患世道人心的原因在于：“恃泉以为理，则上下知有利而不知其义。”^③天下世人只知道钱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其致使人们贪婪腐败的一面，作者不禁反问“泉果利己乎？”对世态人情进行了讽刺。

假传，作为传记中的一种，以史传笔法将物品当作人来写，不仅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模式，记载了人物的家世出身、性格品行等主要事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传主即物品的功能和影响。而且还融合了小说、寓言中夸张、荒诞的写作手法，塑造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以游戏的态度将历史典故、情景敷衍成篇，作为传主的主要事迹，或暗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或隐喻人物的道德品行，或表现人物的成就影响，并且以语带双关的句子和词汇展现人物的言行事迹，暗含了物品所具有的功能特性。通过诙谐幽默的笔墨，寄寓了作者对于自身仕途穷达、道德品行以及社会问题的见解和看法，展现作者的人生社会理想。假传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下面再谈一下古代类传的大致情况。

① 高明：《全元文》第51册《乌宝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② 吴应紫：《全宋文》第356册《孔元方传》，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220页。

③ 贝琼：《全元文》第44册《古泉先生传》，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485页。

所谓类传,就是将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写在同一篇传记里,并以类为标题的传记形式,是古代传记的一种重要形式。

第一,类传的创立与分类

类传最早由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分别用本纪、世家、列传三种形式来记载不同阶层的历史人物。在列传中,又分为单传、合传、类传和附传四种形式。类传,即将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事迹合写为一篇传记。类传的设立主要是依据历史人物生平行事中的共同特征而定。《史记》中的类传包括《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十五篇,在“七十列传”里,类传就达到了七分之一以上,可见分量之重。《史记》之后的二十五史都继承了《史记》的这一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曰:“列传,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①《史记》之后,各朝之史传大体依照此体例编排人物类传,但并不拘泥于《史记》之旧名,以“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为原则,根据各朝代不同的时代特点新增或删除类传,如《汉书》无《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加了《西域传》;《后汉书》增加了《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新唐书》增加了《公主》《藩镇》《奸臣》三传,《逆臣》中又分为《叛臣》《逆臣》两类;欧阳修《五代史》另立了《家人》《义儿》《伶官》等传;《明史》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等等。除增删类传名目之外,还有改变类传名称的,例如《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后魏书》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6页。